

前 言

我们这期《文史资料汇编》，仍为不定期内部发行刊物，仅作内部交流，供史志研究工作者参考。

本期选编史稿十二篇，其中社会史稿六篇、自然志六篇。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仍本着“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求完整”的原则和多说并存的精神，选印了具有研究性质的《镇赉古史略考》和《沙俄煽动乌泰叛乱血染镇东大地》等文章。

乌泰叛乱事件，在我县民族关系史上，一度影响很大。为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与性质，作者跑遍全县和近半个中国，查阅了大量资料，访问了不少知情老人。作者对史料的负责精神和为民族团结的关心，值得赞赏。希望有更多的热心于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同志为我们多撰稿。这期还编选了几篇自然史志。洮儿河、月亮泡、嫩江是我县人民繁衍生息之母，玻璃营子西北岗遗址、矛形石犁是我们祖先几千年前在这里生活的见证，读一读，可以唤起我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感情。

在我们征稿过程中，承蒙一些同志为我们积极撰稿，不少单位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有的为我们创造方便条件，有的为我们提供史料线索或资料，使我们的征集、研究、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由于我们的工作经验少，编辑水平低，一定会有这样或

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诚诚地希望读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不吝赐教，指出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再版补正和提高。

稿 者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文史资料汇编

第五辑

政协镇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镇赉古史略考.....	吉万方
沙俄煽动乌泰叛乱血染镇东大地.....	吉万方
勤劳奉仕苦.....	刘 月
回忆镇赉县蒙民自治科、莫莫格蒙民自治区、大队的成立.....	包天龙稿、宋德馨整理
解放前的镇东教育.....	马玉萱
回忆我的爸爸丁玉珂.....	丁积礼
镇赉县自然概况.....	吉万方供稿
洮儿河.....	吉万方供稿
月亮泡.....	吉万方供稿
嫩 江.....	吉万方供稿
矛形石犁.....	镇赉县文物管理所李景冰供稿
玻璃营子西北岗遗址.....	镇赉县文物管理所李景冰供稿
征稿启事.....	

镇赉古史沿革略考

吉 万 方

镇赉，地处北国，建治虽晚，但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是祖国密不可分的领土。远在石器时代，松辽平原就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境内坦途、莫莫格、大屯、沿江等多处遗址、遗迹，证明了原始部落的存在。有人考证，这一带出土的动物化石、石镞、石箭头、陶器等，都和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同类器物相似，有的完全相同。我县境内坦途西岗子遗址、遗迹和肇源县白金宝遗址、遗迹，是松花江中游流域原始社会遗址、遗迹的代表（见刘振和《黑龙江源远流长》一文）。

自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时代起，直至南北朝的千余年间，在这茫茫北国草原上，曾有东胡、肃慎、鲜卑、契丹、夫余等诸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周秦以前，中国北部最早的居民是古老的肃慎（亦称息慎）和山戎两个主要民族。山戎居西辽河流域，肃慎居黑龙江流域。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时北抚山戎，发息慎”，后息慎败而臣服。因而《大戴礼记·少问篇》记载：“禹、舜、成汤、周文王时，肃慎来服”，故《左传》中说：“肃慎、燕、亳，吾北国土地。”上述记载说明，禹舜时代，北国就臣服于中原。后来，北国逐渐形成四支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即遗古斯满族、东胡族、夫余族、中亚细亚族。活跃在松嫩平原上的是夫余

族。

西周中叶起至秦，境内属于辽东塞外地区，为东胡游牧民族生息之地，后为夫余所侵。因夫余距中原地区较近，地势“于东夷中最为平敞”，在汉代先进的封建文明影响下，最早突破了原始氏族公社制的束缚进入奴隶社会，并以今农安为中心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夫余王国。境内隶属北夫余。

汉武帝时，东北地区设辽东、辽西、乐浪、玄菟等四郡（后变带方、乐浪、玄菟三郡），境内隶属玄菟郡（郡治设今通化、集安一带，后移至锦州地区）。《后汉书·夫余传》记载，北夫余在玄菟北千里。《吉林通志·海龙高丽王墓碑》记载，北夫余在今黑龙江地带，均指此境。当时北夫余的势力，大致在吉林北部地区，东到张广才岭，西抵大兴安岭，北至弱水（嫩江）两千余里的广大地界。整个嫩江流域均隶属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频繁的战争，疆域多变。当时松嫩两江、洮辽二河，是北国通往中原的重要航道，故各族王公，均拼力争夺这一要冲。公元四世纪末，居住在大兴安岭丛林地区的拓跋鲜卑族逐渐强盛并建立北魏政权，一度统治了中国的半壁河山。鲜卑在嫩江中下游地区，建立了封建制的乌洛侯国，后臣服于北魏。据《东三省古迹遗闻》记载：“魏之乌洛侯国，地居北海。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其国北有完水（黑龙江），东北流合于难水（嫩江）。其国当在今奉天洮南地方”。我县境内正处中温带湿润地区，无疑应隶属之。南北朝时，勿吉驱除夫余王等，据有北方大部。

《魏书》记载，延兴中，勿吉密约百济破高丽，方乙力支初发高丽时，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尔河（洮儿河）沉船于水，登路南行，渡洛孤水（辽河），从契丹西界达和龙。由此可

知，我县境内正置勿吉、契丹界。

隋唐时代，室韦（肃慎后裔）各部逐渐强盛，占据了北起兴安岭，南至洮儿河广大地带。《新唐书·东夷列传》记载：“达后，室韦种也，在那河（难河即嫩江）阴、冻（凉）朱河之东，西接黄头南韦，东北距达未娄。”此记载说明达后部处在嫩江之东，松花江之南一线，而镇赉境内恰属嫩江西黄头室韦部所居。至唐贞观三年（公元627年），李世民为统一中国，曾亲率大军北征，兵及内蒙和白城一带，降服东突厥等北方各部，从此，中原王朝在整个松辽平原和黑龙江流域，开始系统地设置了一整套统治机构。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6年）设松漠都督府于营州（今朝阳）；公元698年，相继建立渤海、室韦等都督府，为平卢节度使所辖。《太平环宇记》记载：“契丹居黄龙（指黄龙府，今农安）之北鲜卑故地，长安（今西安，古为唐都）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城”，“从前汉兵未尝到此”。由此观之，唐以前北国虽臣服于中原，但汉民族在东北地区亲手建治，还始于松漠府。

宋以后，北国又被契丹所占领。契丹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十世纪初，契丹族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草原上的契丹各部。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后改为辽）。公元929年，阿保机灭渤海、室韦等部，把其所辖全部并入辽的版图。境内隶属上京道泰州（洮南城四家子古城），归临潢都部署司所辖。辽王朝与北方各民族战争频繁。《辽史·本纪》记载：“天祚七年正月，女真军攻泰州，东北诸军溃复下泰州。”我县境内是这场战争的古战场。

金初，东北路境内设置了“乌古敌烈部招讨司”，后迁

至泰州（后期在他虎城建新泰州，亦称长春州），并在此设置了东北路招讨司，设分司于金山（今科右前旗公主岭城），以防草原上新兴起的蒙古民族。境内东部隶属长春州，西部隶属泰州。辽天庆六年（公元1116年）泰州为金兵占领后，由于地处洮儿河，土质肥沃，“适于稼穡”，金康宗长子宗雄向太祖阿骨打进谏，移民垦殖，遂命都统婆卢火率部民万户迁此守边，聚落日增。至金章宗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降为金安县。

十二世纪末，金朝势力日趋衰微，成吉思汗乘机崛起。公元1234年，金朝为蒙古所灭。成吉思汗把北国广大土地分封给他的几个弟弟。哈拉哈河流域及科尔沁草原为二弟哈赤温封地；嫩江以东大部土地为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封地。境内应为哈赤温封地（有人说是斡赤斤封地）。1288年（至元24年），元世祖忽必烈平定诸王之乱后，改泰州为泰宁路，隶中书省。《元史·仁宗纪》记载：“延祐二年二月庚子，改辽阳省泰州为泰宁府。”“延祐四年二月癸亥，升泰宁府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

明王朝建立后，明朝大军出师东北，消灭元残系纳哈出势力，统一了东北全境，设三百八十余处卫所，加强统治，为开发东北边境做出贡献。境内隶属奴尔干都统司的塔尔河卫。洪武二十年（1357年）境内属元后祖乌梁海（亦称兀良哈）酋领之领地。明末，乌梁海自立国号为“科尔沁。”

清初，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野心勃勃，企图乘明末社会动乱之机，兼并内蒙各部，称霸漠南。新兴的后金政权（清初，国号后金），采取团结漠南蒙古各部，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林丹汗的政策，因此，科尔沁、扎鲁特等部相继来归。此后，科尔沁列为清朝版图。清太祖将科尔沁部分为

左、右六旗（后增四旗，即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郭尔罗斯前、后旗），分封给乌梁海的后代，为世袭领地，境内隶属科尔沁右翼后旗与扎赉特旗。

清天命年间。图什业图旗祖奥巴之表弟——图美，随从奥巴来朝，赐号岱达尔汗。崇德元年，封岱达尔汗之子拉麻什希为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衔扎萨克。至乾隆三十三年，以萨木昆勒扎木苏（即苏鄂公）袭封，传至八世，直至贝子衔扎萨克乌思虎布彦、百仁那木瑚。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3年），由省派蒙旗行局驻段勘放，境内划为八个荒字段（原镇东），即恭字段（南部）、宽字段（中部）、信字段（北部）、敏字段（东北部）、惠字段（东南部）、马鞍山段、新字段（葛连昭一带）、明字段（乌鸦站，现属扎来特旗）。直至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始行放竣，由蒙古地局发放红契，镇基方定。1909年（宣统元年）设置镇东县。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镇东、赉北两县合治，取两县字首，建镇赉县至今。

沙俄煽动乌泰乱叛

血染镇东大地

吉 万 方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少数蒙古王公贵族的叛乱事件。这便是我国近代东北历史上罪恶的科尔沁右翼前旗郡王乌泰等人的叛乱事件。这场叛乱给镇东和洮南府所辖其它各县的蒙汉人民酿成巨大的灾难。

在历史上，对这场战乱的根源及其性质，一直没能做出确切的结论。民国十六年（1927年），镇东县知事陈占甲撰写的《镇东县志》，对此次乌泰叛乱的原因及其给镇东人民带来的灾难，虽作了些记录与分析，但没有把事件的原因及其本质说清楚。《志》中写道：“镇邑放荒之初，蒙汉杂居，因语言不通时生误会，汉人又以蒙民愚而欺恒轻侮之，遂促成蒙民仇视之心，此蒙乱之原因一也；时县中之捕盗营及巡警多为蒙人，已与人以可乘之机，复编乡壮为八牌，所有牌长壮丁亦均系蒙人，致养成绝大势力，此蒙乱之原因二也；迨满清逊国，宣布共和，本五族一家，罔分畛域，逾蒙人昧于共和，真意疑汉族势长，满蒙被摈，遂起而为难，此蒙乱之原因三也。有此三大原因，遂一发而不可遏

止，致演成空前惨剧，殊可悲也”（标点笔者所加）。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长河中，民族之间的矛盾纠葛是屡见不鲜的，而且也正是这些矛盾斗争，推动着我国历史发展和统一。人所共知，民族矛盾的历史，归根到底还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史，但是，这种民族之争，一旦被帝国主义者插足，其矛盾势必发生质的变化。从现象上看，乌泰等人的叛乱，是少数蒙古族王公贵族中分裂主义分子的叛乱，而镇压这次叛乱的军事行动，应该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分裂割据势力，反对出卖祖国和人民利益的正义斗争。为了弄清乌泰叛乱的本来面目，还必须认真考察一下乌泰叛乱的历史背景和其本人的所做所为。

十九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激烈争夺殖民地阶段。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多次的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勒索了大量赔款，割据了中国领土，控制了我通商口岸，强行设置租界。帝国主义在我国取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内河航行、传教自由等一系列特权。为了保其在华的利益，极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派遣大量军队驻扎在我国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从军事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帝国主义之间在我国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妄图瓜分我国领土的斗争，造成了中国被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悲惨局面。我国东北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争夺已久的地方。日俄战争后，日本排挤了沙俄在南满的势力，霸占了我东北的南部，沙俄退到北满，紧紧地抓住了我国东北的北部。他们竭力扶植和勾结中国各民族中反动势力，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中国的反动势力为了保护它们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权力，也极力投靠帝国主义。

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卖国求容的清政府宣告结体。此时，帝国主义列强乘民国政府未稳，加快了瓜分中国的步伐。沙俄政府首当其冲，费尽心机，在我国北部边境，百般寻衅，制造事端，为其瓜分中国寻找借口。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出马，公然叫嚣要“把中国分裂成几个独立国家”。其目的在于“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765页）。为达上述目的，便乘机在我国新疆、外蒙和东北等地大搞蚕食我国领土的罪恶活动。在导演外蒙“独立”运动，宣布建立“大蒙古国”的同时，又积极在内蒙煽动少数蒙古王公贵族搞起“独立”活动。

沙俄首先煽动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王公“独立”，一九一一年九月，以额鲁特、陈巴尔虎两旗的总管胜福、车和扎等人为首，召开秘密会议。在外蒙叛军支持下，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占领了海拉尔，宣布“独立”。与此同时，沙俄又把魔爪伸入内路，积极策划科尔沁右翼郡王乌泰的叛乱。

沙俄为了瓜分中国，早已把侵略内蒙地区作为重点。

《日俄条约》规定：“俄之行动，表面上日疏，而图蒙之心，未尝不日密。”沙俄之侵略计划中，洮南府占有特殊地位。从战略角度看，洮南府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自古洮、辽二河是连接内路，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况“洮南既据，北满不孤”，且可以“联吉黑之气”（《东三省政略》蒙务篇2页）。沙俄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就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侵略活动。沙俄曾多次派人来此“游历”，搜集经济情报，密绘地图，有目的地联系蒙古王公，使之事俄。直至乌泰叛乱失败后，沙俄仍贼心不死，继续在这一地区活动。如一九一四年七月，俄人分三夥，每夥二十余人，

分别在靖安（白城）、葛根庙和我县境内力格吐（东屏镇葛力吐）等地进行非法活动。经查明“每夥马十二匹，带连株枪十六棵。内有洋官二名，一名包保，一名卜根通事。询问均是画地图而来。”九月十四日还发现“俄人二十余人在旗（我境隶属科右后旗）东哈塔吐屯处，午间即往南去。又在信艾力（我境内胜利乡西乃力）俄人二十余人”活动（《奉天省洮昌道公署飭》第八四七号）。沙俄的主要意图就是寻找其代理人，乌泰就是其中一个。

乌泰生于一八六〇年，内蒙科尔沁右翼前旗（即扎萨克图王旗）。青年时代，出俗做了喇嘛。该旗一世祖达布齐于崇德元年（1636年）封官赐爵札萨克图多罗郡王，世袭罔替。第十世郡王塔特巴札木苏无子，逝世后过继第七世郡王的弟弟协理台吉布彦彦图的次子根敦占散为嗣，承袭爵职。根敦占散病故，其兄乌泰还俗为嗣，爵职全称札萨克多罗札萨克图郡王，兼任哲里木盟副盟长。光绪十年（1884年）被赏戴三眼花翎，光绪二十年（1894年）被赏穿黄马褂（见田志和《乌泰传记》一文）。

乌泰之先郡王执政时期，欠下一笔还不清的大债。为了填补这一亏空，乌泰竟不顾国法私自放荒地，蒙民垦户增至一千二百六十多户。不仅侵犯了当地牧民利益，也破坏了《理藩院则例》和《户部则例》等有关条款。协理台吉朋束克、巴勒珠尔等人以“敛财虐众，不恤旗艰”为罪两次向盟长、理藩院投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根据哲里木盟长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的报告，将乌泰“暂时撤去扎萨克印务”，听候朝廷处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经盛京将军增祺奏准及理藩院核议旨准，撤原决定，给以革去副盟长职务的惩处。至此，乌泰威

信大降。

一九〇〇年东北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口实，派大批侵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血腥镇压义和团，其中一部分骑兵侵入科尔沁右翼前、后两旗，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察尔森等地驻扎一百六十多人。一九〇一年，沙俄驻旅顺的南满俄军总司令，关东地区长官两列克谢耶夫，指派驻齐齐哈尔的外交官巴克达纳夫上校，专办“蒙古各部经营联络事宜”（于熙兴《奉天三省总督奉天巡抚》文，旋即派武官格罗莫夫进入哲盟十旗“游历”。刺探蒙旗王公动向。格罗莫夫首先结识了被解除副盟长职务的乌泰。当时该旗乌古木地方群众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在刚保桑宝、萨那多尔济领导下，正掀起反对王公贵族压迫的斗争。乌泰等人借助俄军力量，镇压了哲盟东部蒙旗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斗争。

这一年冬天，乌泰私自揣带印信潜往齐齐哈尔，会见俄国外交官索克宁和统领伊勒门，申谢前助。不久，乌泰又以“避难”为辞到哈尔滨会见伯力总督哥罗德阔夫。“俄人为之备馆舍、具饮食丰厚”（《东三省政报》《蒙务篇》45页），并派兵护送，专车接迎，“赠快枪十二杆”。乌泰由一筹莫展转而受宠倍至，拿出自己照片祈总督：“请转呈俄皇”，并诉称中国“欺压蒙部太苦”，一再向伯督求庇护，充分表现出一副奴颜媚骨，摇尾乞怜的巴儿狗相。哥罗德阔夫当即答应：“代奏俄皇，设法保护。”

乌泰私揣印信出走一事，违反朝廷禁令，于一九〇二年又被手下台吉指控。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帝谕军机大臣等，“理藩院奏，台吉呈控盟长通匪据情代奏一折，所控札萨克图郡王乌泰敛财虐众，不恤旗艰，通匪抢掠，致将札萨克印

信不知去向。前后所报两歧，情节支离，亟应彻底根究，著裕德会同增祺，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光绪朝东华录》五卷16页）。钦差大臣、兵部尚书裕德根据乌泰被控事由，查实后决定给予革去札萨克职、留位三年以观后效的惩处。清廷准奏，革去乌泰的札萨克职，从此，乌泰的处境每况愈下。次年，乌泰经俄军官格罗莫夫介绍，不顾朝廷的教育挽救，又私自与俄驻哈尔滨官员卡伊钦斯克谈判借贷，后经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电告俄国政府批准，以全旗矿产牲畜作抵押，从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二十万卢布放贷给乌泰。从此，乌泰就被沙俄牢牢地抓在手上。俄人以巨款相助，乌泰自然对俄附首贴耳。

一九〇四年二月爆发了日俄战争，战争正酣之际，俄国外交官要求乌泰派代表去库伦（乌兰巴托）拜见西藏达赖第十三世活佛，帝俄阴谋策划蒙藏“独立”。俄国政府表示，一旦蒙藏“独立”得以实现，允“给乌泰枪二十万杆、炮一百五十尊，分给各蒙旗”（《奉天三省总督奉天巡抚奏文》）。沙俄的反动伎俩遭到大多数蒙旗官民的反对，绝大多数台吉、喇嘛不愿跟随乌泰肇乱。乌泰很孤立；加之九月俄国战败，无暇兼顾，至使蒙藏“独立”夭折。一九〇六年，贪婪成性的乌泰又潜入哈尔滨，以旗界山林作抵押，向俄国贷款九万卢布。奉天总督赵尔巽闻讯后，命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调查其中“诡谋”。程派于颢兴等人前往访查，对乌泰进行热情劝阻，并奏请为乌泰免息银六万两，借贷银两万一千两。经盛京将军奏准，恢复乌泰札萨克职务。遗憾的是乌泰耍阿两派伎俩，用谎言欺骗朝廷，继续靠近沙俄。一九〇八年乌泰与俄之借款限期已到，乌泰无力偿还，俄人逼债要挟。洮南府知府孙葆琛得知此交涉事件后，出面调查。乌泰

受形势所逼，只好将欠债六十余万元之数额全部交待。奉天省署意识到乌泰之俄债事件要害在于俄要的“要挟之计”，应及时妥善处理，“以揭俄人阴谋之计”。经与俄人交涉，最后迫使沙俄接受还本免息的偿还原则。理藩院从爱护乌泰角度出发，向朝廷呈报了《乌泰京债免还折》，清廷同意此奏，乌泰京债全部免还。至此，朝廷对乌泰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乌泰对朝廷的大恩大德，理应有报，痛改前非，回心转意，以诚报效朝廷。恰恰相反，怨恨之心愈加加深。

一九一一年爆发了武昌起义。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清王朝覆灭，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乌泰由于长期受沙俄的恩遇，便乘此时挑起民族分裂、积极煽动策划投靠沙俄分裂内蒙的“独立”活动。继外蒙宣布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开始了他的叛乱准备活动。一九一二年初，乌泰派葛根庙喇嘛锡勒图和协理台吉诺庆额去库伦，就内蒙“独立”一事求助。乌泰得步枪一千二百支、子弹五十万发的援助。外蒙叛军还派四十五人开进科右前旗王府，以示援助。沙俄先后卖给乌泰步枪三千只、子弹一百一十万发，并备子军服万余件。乌泰极力煽动民族分裂，但大多数群众始终反对民族仇视，眷恋故土，反对外向，“老弱不愿应募者，号哭于道，纷纷避迁”（《洮南府政省署电》）。最后仅纠集三千五百余人，拉成队伍，于同年八月十六日，行文靖安县（白城子），“令地方官退出”。八月二十日乌泰叛军在白庙宣布“独立”，“驱逐汉官”。乌泰叛军分三路，企图攻取靖安、镇东、醴泉（突泉）和洮南府，同时散发了《东蒙古独立宣言》。《宣言》中说：“今库伦皇帝劝导加盟，俄国借给武器弹药，给以援助，故宣告独立，同中国断绝关系，”充分暴露了乌泰叛乱与沙俄煽动的主奴关系。

乌泰“独立”一事，被参与策划的同党阜海所举发（《阜海致黑龙江都督函》）。奉天总督赵尔巽得知乌泰叛乱之消息后，立即从吉、黑、奉三省调集军队驻守各要路。

乌泰兵发首攻镇东。我镇东县令陆庆曾闻讯，当即“遣人飞禀洮南府都统乞援，并派巡官李广才特函公府（科右后旗镇国公）禀报”。陆庆曾虽有戒备，但因兵力有限，加之对这场叛乱波及范围、规格、合谋同党及境内协同者并不清楚，甚至毫无觉察，势必措手不及。其实，乌泰叛乱，科右后旗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是其同族同党。札赉特旗札萨克王也准备同时叛乱，后被黑龙江都统劝导，遂取消了叛乱的念头。同时又稳住了郭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的局势，造成乌泰孤力无援的被动局面。唯有拉喜敏珠尔以种族疆域之纠葛为词，逼陆庆曾退出县邑。于八月二十日中午，蒙古叛军三百余骑一拥而入，猛攻镇东县邑。

镇东初建新邑，周围无城郭可据，地悬边徼，援兵亦缓不济急。陆庆曾亲自督战迎敌，但因汉军捕警力单，加之军警中蒙人德立根仓、三升阿、天宝、彭四格、泥马喇嘛、白音杜冷等三十余人反戈相向，造成里外夹攻的不利形势，汉军寡不敌众，当即有四名捕警阵亡。陆庆曾在众寡悬殊，无力抗争之窘境下，乃怀印携眷潜逃，县邑遂陷。乌泰叛军所到之处，恣意烧杀，室庐为虚。整个县境几无一块干净土地。广大蒙汉群众，惊恐万状，四处逃散，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商民之被难者男女凡三百余人”，焚毁百姓房屋“二百余间”（《镇东县志》）。

乌泰肇乱后，国务院电告奉、吉、黑三省都督：“现经国务院会议决定，以兵力从事”（南京档案馆《国务院致奉天、吉林、黑龙江都督电，扎旗牵涉全盟决定以兵力从事可

即迅速赴机》)。洮南府统领吴俊升于八月二十三日晨，率六百骑兵，至镇西南高家店即与南下的叛军短兵相接。因叛军本乌合之众，一击即溃。二十四日，汉军分遣三百骑兵追逐，至公合勒（东屏镇）叛军北逃，遁迹山谷，救回难民三百余车。

沙俄闻知乌泰兵变，便偷偷蠢动起来。从富拉尔基开出一千多人进入战区；另有八万正规军开进中东路和北满支线沿站驻扎，摆出跃跃欲试，随时可以介入的架式。于此同时，我东三省总督调集奉、吉、黑三省部队，驻守要路，奋然出击。黑龙江省派许兰洲统帅步兵、炮队，驻繁星、龙江一线，相机防剿；奉天省派后路巡防统领吴俊升带马步兵十营及山炮一营，出击叛军；吉林都督陈昭常命令陆军第二十三镇十六协马步两营，开到新城（扶余）一带防守，第回十五协赵振刚部进入农安，长岭、大赉一线警戒，形成南、北、东三面夹击的作战局势。九月十二日攻下葛根庙，同日攻克乌泰王府扎萨克图。叛军溃散瓦解，乌泰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下，携眷逃往索伦山，经呼伦贝尔逃往外蒙。

乌泰、拉喜敏珠尔的叛乱波及很广，整个洮南府属地和扎赉特旗皆被叛军骚扰。至九月三十日，叛军被歼六百余人，死于战乱兵燹之无辜蒙汉等各族群众达两千五百余人，被毁房舍五百余间。叛军在我境内东北乡援代赉（今建平乡抱太来）屯设置杀场。凡附近村屯，未及逃脱者，不分男女老幼，咸被缚至刑场。叛军残无人道，杀气腾腾，百姓束手待毙，嚎如山崩，当场被杀害者达一百五十七人。其中五家子屯陈珠，一家十三口人全部遇害，他不冷屯蒙族周九月，一家十口，博特昭屯汉族袁世明一家六口亦全部惨遭杀害……一场罪恶叛乱，汉族人民惨遭杀害，蒙族人民亦未幸